

§ 政治学、哲学研究 §

高丽睿宗与道教

黄 勇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睿宗是高丽王朝最崇道的国王,其道教信仰和崇道政策受到高丽王室的信道传统和他身边道流人物的影响。睿宗举行的斋醮活动都是出于护国佑民、祈福禳灾的现实目的。他大力推动引进宋朝道教的政策,除了为提升高丽道教水平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借助道教树立本国文化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 高丽睿宗; 道教; 斋醮; 道流人物

中图分类号: B9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4) 04-0101-08

道教在七世纪已正式传入韩国。到高丽王朝(918—1392),道教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从第八代国王显宗(1010—1031年在位)开始,几乎每代国王都要举行道教斋醮活动。在高丽诸王中,睿宗王侯(1105—1122年在位)无疑是最崇道的国王。虽然他并不是举行斋醮活动最多的,但其举行斋醮活动的频次却远远高于其他诸王;^①他大力推行道教的举措更是其他国王所不及。在位期间,睿宗优遇道流人物,^②加强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从宋朝引进纯正的科仪道教,使高丽道教臻于成熟,取得了接近国教的地位。^③睿宗的崇道行为反映了其“三教鼎立”的治世观,^④也体现了其“文轨同乎中夏”^⑤的治国理想。

一、睿宗道教信仰的来源及其与道流人物的关系

睿宗的道教信仰主要来源于高丽王室的宗教信仰传统。高丽王室有信仰道教的传统,立国之初,太祖王建就在松京创建了用以举办醮祀活动的九曜堂;^⑥《太祖训要》第六条要求后世子孙保护道教性质的八关会,^⑦从而确立了崇尚道教的立国原则。自显宗之后,王室的斋醮活动日益频繁。王室生活中浓厚的道教氛围,自然会使睿宗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此外,睿宗之父肃宗也对他有重要影响。在册立睿宗为太子的前两天,肃宗曾“亲醮于毬庭”,^⑧此中必有深意。此后,肃宗还先后两次命太子亲自主持醮祀活动。^⑨肃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在引导睿宗信仰道教。不过,对睿宗崇道政策影响最大

作者简介: 黄勇(1972—),男,河北大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基金项目: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韩国道教史研究”(14BZJ032)、2013年四川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中韩关系史上的道教交流”(SC13B052)

^① 金澈雄《高麗中期道教^①盛行^②其性格》,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③韓國的變容》,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6年,第171页。

^② 在依宋制建造中国式道观福源宫之前,高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士,但是有很多通晓道教之人。这些人或为儒生,或为学者,或为僧人,或为隐士,或为朝臣,或为小吏,或为医生,或为术士,不一而足。虽然他们身份各异,但是都表现出明显的道教倾向,因而可以宽泛地称之为道流人物。

^③ 车柱环《韩国道教思想》,赵殷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④ 梁银容《福源宫建立^①歷史的意義》,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②韓國文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496页。

^⑤ 金缘《清燕阁记》,《东文选》卷六十四,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420页。

^⑥ 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太祖世家一》太祖七年,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⑦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太祖世家二》太祖二十六年四月,第26页。

^⑧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一《肃宗世家一》肃宗五年正月癸巳,第164页。

^⑨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一《肃宗世家一》肃宗七年二月丙申,卷十二《肃宗世家二》肃宗十年正月癸丑,第169、176页。

的还要数他身边的道流人物。

与高丽其他国王不同,睿宗身边有一个人数较多的道流人物集团。这些道流人物大多是他做太子时的僚佐,而且相互间都有亲戚或师友关系。睿宗与他们朝夕相处,自然会受其影响。睿宗即位后,这些人对睿宗的道教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韩安仁可以说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韩安仁,原名韩嫩如,睿宗潜邸时为太子侍学。睿宗即位后,韩安仁“以旧恩密近用事,恩宠浸优”,一生官运亨通,最后成为睿宗的顾命重臣。表面上看,韩安仁只是一位朝廷重臣,似乎跟道教没什么瓜葛,然而,《高丽史》本传说他“明达好学善属文,又善易筮,事多奇中”,^①可见他是个有道教倾向的人物。宋人徐兢《高丽图经》记载“大观庚寅,天子眷彼遐方愿闻妙道,因遣信使,以羽流二人从行。遴选通达教法者,以训导之。王侯笃于信仰,政和中始立福源观。”^②大观庚寅即大观四年(1110),高丽睿宗五年。据《高丽史》记载,睿宗三年韩安仁曾奉命出使宋朝。^③梁银容教授的研究表明,韩安仁使团曾向宋徽宗“进言”,要求学习道教,宋徽宗派道士赴高丽传教是应韩安仁使团之请。^④由此可见,睿宗朝最重要的道教的政策,即从宋朝引进道教以提升本国道教水平,是由韩安仁开启的。睿宗十三年(1118),经过同宋朝的长期交流和学习,依照宋制建成本国道观福源宫,^⑤从此,高丽拥有了规范化的科仪道教。是年闰九月,韩安仁奉命在清燕阁讲《老子》。^⑥清燕阁是研习儒家经典的机构,这次讲《老子》是清燕阁讲学史上唯一例外,此次讲学显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活动,而是为了纪念从宋朝引进道教。^⑦

韩安仁只是引进宋朝道教政策的开启者,李仲若才是这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最终完成者。李仲若是韩安仁的女婿,就现存文献来看,他可以说是高丽时期道教色彩最为纯正的道流人物。据《逸斋记》记载“先妣李氏尝梦黄冠而遂有娠,故先生幼而嗜读《道藏》,服事真风,……常宅心事外,脱落羁束,弃家归隐于加耶山,自号青霞子。”后来经无等山处士殷元忠指点,李仲若在道康郡月生山筑逸斋草庐隐居修炼,“恒以幅巾鹤氅登其顶,燕坐弥日,如抱叶之蝉,凝目之龟,淡乎自处。《黄庭》在左,素琴在右,或抚而弄之,声振林木。……与扶桑公、陶隐居、张天师遥为师友。盈缩造化,轳轳璇玑,漱亭午之元气,思青冥之轻举,待其功圆行满,驾龙辔鸾,上朝玉帝”。肃宗病危时,李仲若因擅长医术受召入宫为肃宗治病,他到达时肃宗已驾崩。可能是其岳父韩安仁的举荐,李仲若自此留在宫中主持道教事务。“后航海入宋,从法师黄大忠、周与龄亲传道要”,归国后上疏创建福源宫,掀起了高丽道教的热潮。^⑧《逸斋记》和《破闲集》均称李仲若为李左司。左司是左司议大夫的简称,秩正四品。^⑨作为一名道流人物,李仲若在政治事功方面并无建树,其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创建福源宫,官封正四品只能是因为他创建了福源宫。睿宗如此重视李仲若,说明他赴宋学习道教,回国后创建福源宫是在执行引进宋朝道教的既定政策,而非个人行为。

韩安仁的姻亲中,李永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道流人物。李永是韩安仁的妹婿,睿宗潜邸时,他和韩安仁同为太子侍学。在《高丽史》的记载中,李永和道教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但是,他被权臣李资谦迫害致死,“资谦遣术士瘞道傍,牛马不敢践。或病疴者就祷则愈。资谦败,永子请改葬,

① 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七《韩安仁传》,第131页。

② 徐兢《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释氏》道教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93页。

③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二《睿宗世家一》睿宗三年七月乙亥,第185页。

④ 梁银容《福源宫建立の歴史の意義》,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と韓國文化》,第491页。

⑤ 建造福源宫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文《高丽道观福源宫考》,《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

⑥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睿宗十三年闰九月丙子,第213页。

⑦ 韩安仁之所以在清燕阁而不是福源宫讲《老子》,恐怕跟他的身份有关。韩安仁虽然有浓厚的道教倾向,但他毕竟是以儒学起家的朝廷重臣。以儒臣身份在道观讲学,必为时议所不容。另外,清燕阁讲学也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学术活动,即使讲述儒家经典有时也会有宗教目的,如睿宗十四年八月大旱,乙亥,命朴昇中于清燕阁讲《洪范》,是日果降大雨。参阅《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五《朴昇中传》,第558页。

⑧ 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55-256页。

⑨ 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十六《百官志一》司议大夫条,第547页。

掘之尸不变”^①可见他也是一位通晓道教的道流人物。韩国古代史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史书很少记录跟道教相关的信息。不能因为史书中没有记载李永和道教相关的事迹,就轻易否定他对高丽道教的发展产生过影响。退一步讲,就算他没有参与过道教事务,但是作为一位道流人物,做太子侍学时也会对睿宗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

睿宗朝声名最显赫的道流人物当属郭舆。^②郭舆,字梦得,肃宗朝名臣郭尚之子。此人“自幼不茹葷,不从群儿戏。……于道释医药阴阳之说,见辄成诵不忘”^③与李仲若“少以文章相友,号神交”。据《破闲集》记载“郭处士璵,睿王在春宫时寮佐也。及上践阼(祚),挂冠长往。”^④睿宗八年三月,“征郭舆,处之禁中。舆……力学工文,道释医药阴阳射御琴棋,靡所不治。……王在东宫识之。至是遣中使召之,赐酒食,与之酬唱。使居禁中,称为先生。以乌巾鹤氅,常侍左右,从容谈论唱和,时称金门羽客”^⑤。郭舆入宫后,甚受睿宗宠遇。就史书记载来看,郭舆受宠似乎主要靠他的文学才华,他和睿宗的诗歌酬唱之作甚至被结集成书。^⑥但是,就时人称其为“金门羽客”来看,他是以道士身份出现在宫中的。睿宗十一年,睿宗驾幸西京,郭舆与金富辙、洪瓘从行,龟山昙秀禅师寄诗云“青云二学士,白日一仙翁。”^⑦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道士身份。再从睿宗称其为“先生”,为其隐居之所亲笔题额“虚静”、“养志”来看,^⑧睿宗也是把他当作道士看待的。依此揆之,睿宗恩遇郭舆,与其崇道政策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位受人瞩目的宫廷道士,郭舆没有参与过任何道教事务,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也许是文献漏记使然,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迫于反对道教势力的压力,睿宗有意让他淡出道教事务。睿宗十年的一件事情便能证明这一点。睿宗十年王字之、文公美出使宋朝,“郭舆请于所居阙西别业饯入宋使副,王特赐酒果,命内官主办,供帐甚隆,物议非之”^⑨。迫于“物议”的压力,郭舆“固求退居”,离开王宫在城东若头山构山斋隐居。^⑩据笔者考证,李仲若正是随这个使团入宋学习道教的。^⑪由此可见,郭舆也是主张向宋朝学习道教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

睿宗时期的道流人物中,郭舆是以方外之人身份出现的,与其相似的还有李资玄。李资玄,字真精,出身权贵之门,自幼“常有紫霞逸想”^⑫。大康九年(1083)与郭舆同科登第^⑬,官至大乐署令。元祐四年(1089),忽弃官逃世,入清平山文殊院修习禅学。^⑭“由是心法流布于海东,惠照、大鉴两国师皆游其门”^⑮成为享誉海东的佛教居士。睿宗闻其名,累诏征之。资玄“遂上表曰‘以鸟养鸟,庶无钟鼓之忧;观鱼知鱼,俾遂江湖之性。’王览之,知不可致。幸南京,使其弟尚书资德谕赴行在,作诗手书赐之。资玄赴召。……问养生之要,对曰‘莫善于寡欲。’遂进《心要》一篇。王叹赏,待遇甚厚。既而固请还山”^⑯。表面来看,李资玄是造诣高深的佛教居士而非道流人物,但是“鱼鸟之喻”、“寡欲之旨”表明,他也受道教影响。另据《东国通鉴》记载,李资玄“服道士之服”^⑰

① 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七《李永传》,第131页。

② 郭舆,《破闲集》作郭璵,其他典籍均作郭舆。本文除了引《破闲集》作郭璵外,均作郭舆。

③ 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七《郭舆传》,第128页。

④ 李仁老《破闲集》卷中,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27、22页。

⑤ 安鼎福《东史纲目》第二辑睿宗八年三月条,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第323页。

⑥ 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十一《睿庙唱和集》跋尾,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232页。

⑦ 崔滋《补闲集》卷下,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147页。

⑧ 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七《郭舆传》,第128页。

⑨ 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八睿宗十年六月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第207页。

⑩ 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七《郭舆传》,第128页。

⑪ 请参阅拙文《高丽道观福源宫考》,《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

⑫ 李仁老《破闲集》卷中,第21页。

⑬ 崔滋《补闲集》卷下,第147页。

⑭ 金富辙《清平山文殊院记》,《东文选》卷六十四,第430页。

⑮ 李仁老《破闲集》卷中,第21页。

⑯ 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五《李资玄传》,第98页。

⑰ 徐居正《东国通鉴》卷二十睿宗十二年九月条,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2年,第50页。

由此亦可见,他有浓厚的道教倾向,也算得上是道流人物。^①李资玄和睿宗没有多少交往,因此他不可能直接影响睿宗朝的道教发展。征召隐居山林的修道之士,以达到野无遗贤的治国理想,是历代帝王塑造自我形象的惯用手段。睿宗通过征召李资玄,达到了把自己塑造为贤明君主的目的。因此,李资玄和睿宗的关系也体现了高丽道教的另一个侧面。

除了和睿宗有过直接交往的道流人物外,殷元忠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高丽史》对其记载仅有三次:肃宗八年应诏入宫,^②肃宗九年十一月“巡视东界山川”,^③曾以道诰之说上书言迁都之事。^④现存高丽时代的文献,只有《逸斋记》和《破闲集》提及此人。根据这两部典籍的记载,殷元忠精通地理风水之术,曾经指点过李仲若;李资玄年轻时曾追随他“密访溪山胜地”,^⑤可见他应该也是道流集团中的人物。由于文献阙如,殷元忠是否参与过道教事务已不得而知。

以上所述只是睿宗时期较有代表性的道流人物,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所有道流人物做逐一考察。但是,仅就以上所述也可发现,道教发展至睿宗时期,在高丽出现了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道流阶层。这个阶层的人物通过姻亲或师友等关系纽带,结成松散的道流集团,并借助他们和睿宗的特殊关系对高丽道教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睿宗朝的道教活动及其目的

睿宗朝是高丽历史上举行道教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在众多道教事宜中,仿照宋朝道观建造本国皇家道观福源宫,是睿宗开创的最重要的道教事业。关于福源宫笔者曾撰专文讨论,此不赘述。其次,睿宗二年闰十月“始置元始天尊像于玉烛亭,令月醮”,^⑥其意义也同样非比寻常。“月醮”属于常祀性质的宗教活动,对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进行常祀,说明道教活动已成为高丽王朝宗教生活中的常规事务,道教已获得了国家宗教的地位。不过,最引人瞩目的还要数频繁举行的各类道教斋醮活动。据笔者根据《高丽史》的统计,睿宗在位期间共举办过三十次斋醮活动。^⑦为明了起见,特以图表形式对各次斋醮活动进行逐条梳理。

据下表可知,三十次斋醮活动中,睿宗“亲醮”就有二十次,占总数的67%,由此可见睿宗对道教的重视程度。宫廷中举办的常规性宗教活动,史书一般不会做专门记录。这些斋醮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均无规律可循,因此,应该都是出于某种特殊目的举办的常祀之外的宗教活动。《高丽史》对大多数斋醮活动举办的原因和目的往往语焉不详。笔者根据每次斋醮活动前后一个时期内发生的各种事情,推证举办斋醮之目的,其结论虽然未必绝对可靠,但自忖庶几近是。

① 道教在韩国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制度化宗教,所以道流人物常常寄寓佛门,表现出一种佛道不分的特点。如高丽毅宗时重修逸斋遗址以纪念李仲若,却要供奉观音画像;朝鲜王朝道教内丹学集大成者金时习祝发为僧,均属这种情况。参阅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第256页;韩无畏《海东传道录》,首尔:普成文化社,1998年,第263页;洪万宗《海东异迹》,首尔:乙酉文化社,1982年,第234页。

②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二《肃宗世家二》肃宗八年十月庚午,第173页。

③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二《睿宗世家一》,第178页。

④ 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二《金谓碑传》,第517页。

⑤ 李仁老《破闲集》卷中,第21页。

⑥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二《睿宗世家一》睿宗二年闰十月庚子,第183页。

⑦ 据《高丽史·礼志》记载,睿宗三年八月丙戌、六年二月己亥“祀老人星于南坛”,李能和认为这两次祭祀属于道教斋醮。在国都南郊祭祀老人星,起源于古代星辰信仰,与道教没有直接关系。睿宗祭祀老人星与《后汉书·礼仪志》所载“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极为相似。老人星信仰后来被道教吸收,出现了以道教斋醮仪式祭祀老人星的情况。高丽毅宗“亲醮老人星于内殿”,就明显是道教性质的祭祀活动,跟睿宗“祀老人星”有较大区别。为慎重起见,本文不拟将这两次“祀老人星”活动统计为道教斋醮。参阅《高丽史》卷六十三《礼志五·吉礼·小祀》杂祀条《高丽史》卷十九《毅宗世家》毅宗二十四年四月辛巳条;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首尔:普成文化社,1977年,第389页。

睿宗在位期间举行斋醮活动一览表

| 序次 | 时间 | 简况 | 目的 | 备注 |
|----|----|--|-----|---|
| 1 | 元年 | (二月) 戊子, 亲醮于阙庭 | 不详 | |
| 2 | 元年 | (七月) 己亥, 王率两府台省两制及三品官, 亲祀昊天上帝于会庆殿, 配以太祖祷雨。 | 祷雨 | 祀昊天上帝本是儒教性质的宗教活动, 当于南郊举行, 睿宗亲祀上帝则属道教性质。 ^① |
| 3 | 元年 | (七月) 丙午, 醮太一于乾德殿。 | 荐冥祐 | 此前两日(甲辰), 召名僧讲《木莲经》, 此前三日(癸卯) 设盂兰盆斋。两次佛事活动目的都是“荐肃宗冥祐”。因此, 此次道教斋醮目的也应是荐冥祐。 |
| 4 | 元年 | (九月) 戊戌, 设消灾道场于乾德殿, 是夜亲醮三界神祇于会庆殿。 | 荐冥祐 | 此前一日(丁酉) 睿宗诣肃宗虞宫, 据此可推知, 戊戌日举行的佛、道活动都应是肃宗荐冥祐。 |
| 5 | 二年 | (三月) 乙卯, 醮太一于乾德殿。 | 不详 | |
| 6 | 二年 | (五月) 乙巳, 醮太一于乾德殿。 | 祷雨 | 四月戊辰至五月乙卯的宗教活动都是为了祷雨, 只有此条没说是否为祷雨, 但应该不会例外。 |
| 7 | 二年 | (五月) 乙卯又醮于乾德殿祷雨。 | 祷雨 | |
| 8 | 二年 | (十月) 甲子, 醮于山呼亭。 | 荐冥祐 | 此前一日(癸亥) 佛顶寺“改名资荐, 以资肃宗冥祐”。据此, 甲子日的斋醮应是荐冥祐。 |
| 9 | 三年 | (五月) 辛酉, 王率宰枢近侍文武三品以上醮昊天五方帝于会庆殿。 | 禳兵 | “五月辛亥, 讲《药师经》于文德殿以禳贼兵”。辛酉离辛亥只隔十天, 在此期间曾大破女真, 因此辛酉日斋醮应与禳兵有关。 |
| 10 | 四年 | 三月戊申, 亲醮三清于赏春亭。 | 禳兵 | 两天后(庚戌) “阅神骑军”, 此后展开一系列讨伐女真的军事行动, 此次斋醮目的应是禳兵。 |
| 11 | 四年 | (三月) 丁卯, 亲醮于阙庭。 | 禳兵 | 丁卯亲醮是戊申亲醮的延续, 自三月至七月还女真九城, 高丽与女真战争不断, 在此期间频繁以佛法、阴阳秘术等禳兵。道教斋醮不过是禳兵活动的一种。 |
| 12 | 五年 | (正月) 甲子, 亲醮于星宿殿。 | 不详 | |
| 13 | 五年 | (十二月) 乙巳, 醮于乾德殿。 | 不详 | |
| 14 | 六年 | 秋七月甲子, 亲醮三清于纯福殿。 | 不详 | |
| 15 | 六年 | 八月甲午, 亲醮于阙庭。 | 禳疾 | 此前四日(庚寅) “王太后不豫”, 此次斋醮应是为王太后禳疾。 |
| 16 | 八年 | (三月) 丙寅, 王不豫, 百官设大醮于会庆殿祷之。 | 禳疾 | |

① 按照儒教礼仪, 祀昊天上帝是天子之事, 高丽国王没有资格祭天。在道教体系中, 祀昊天上帝则并非天子之专属, 所以高丽国王完全有资格祭祀昊天上帝。其实, 睿宗之父肃宗就已举行过这种祭祀, 《东国通鉴》载: “(七年) 夏五月, 王率群臣醮上帝于禁中, 配以太祖。”“醮”字说明这是一场道教性质的宗教活动。李朝史臣注意到了“醮”与“祀”的微妙差别, 对肃宗“醮”上帝, 《东国通鉴》的编纂者未置一词; 对睿宗“祀”上帝却大加挞伐, 在史臣按语中酷评道: “睿宗因旱祷雨, 未有格天之德, 求媚于佛, 经行街衢, 已失礼矣, 况祀天不于郊而于殿, 失礼之中, 又失礼焉。语曰: 吾谁欺, 欺天乎? 睿宗之谓也。”对比睿宗“祀上帝”和肃宗“醮上帝”的史料可以看出, 这是两场同样性质的宗教活动。对睿宗用“祀”不用“醮”, 只是史官在记录这一事件时偶然为之, 并不能说明睿宗“祀昊天上帝”是儒教性质的祭祀活动。韩国学者金得槐认为肃宗“醮上帝”祭拜的是玉皇大帝, 此说不确。宋朝在真宗时代已开始用道教方式祭祀昊天上帝, 但是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并不是同一个神, 当时玉皇大帝的地位次于昊天上帝。政和六年(1116), 宋徽宗才试图把昊天上帝与玉皇大帝合二为一。高丽肃宗和睿宗醮祀昊天上帝均在政和六年之前, 所以醮祀的昊天上帝不可能是玉皇大帝。但是不可否认, 高丽以道教方式祭祀昊天上帝应该是受宋朝道教的影响。参阅徐居正《东国通鉴》卷十八肃宗七年条, 第548页; 金得槐《韩国宗教史概述》, 何雋译, 载沈善洪主编《韩国研究》第一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308页。

续上表

| | | | | |
|----|-----|---------------------------|-----|---|
| 17 | 八年 | （四月）戊申祷雨于九曜堂三日。 | 祷雨 | |
| 18 | 八年 | （闰四月）辛酉，亲醮于阙庭 | 不详 | |
| 19 | 九年 | （二月）己未，亲醮本命于乾德殿。 | 祈福 | 睿宗生于文宗三十三年己未，其本命日当为己未，因此这次斋醮应是睿宗的本命醮。 ^① |
| 20 | 九年 | （四月）丁卯，亲醮阙庭。 | 禳灾 | 两天前（乙丑）“大雨雹震文德殿东廊柱，丙寅雨雹，御史大夫林有文等以灾异引咎辞职”。雨雹才结束就举行斋醮，应是为了禳灾。 |
| 21 | 十年 | （三月）戊子，亲醮于毳庭。 | 不详 | |
| 22 | 十年 | （十月）辛亥，亲醮下元于纯福殿。 | 解厄 | 下元为水官，水官解厄。是年正月阿骨打称帝，国号金。金国势强盛，契丹衰落，金灭辽已如箭在弦。八月以来，辽持续施压让高丽出兵伐金，高丽采取拖延策略。此时举行下元醮，当是为国解除厄运。 |
| 23 | 十一年 | （正月）甲子，醮三界于内殿。 | 解厄 | 此时金灭辽的战争激烈进行，作为辽的属国，高丽国运堪忧。此时醮三界当是为国祈福解厄。 ^② |
| 24 | 十一年 | （四月）壬申，醮三界于长乐殿。 | 解厄 | 为应对辽、金战争造成的边境压力，三月乙卯睿宗幸西京。此次斋醮在西京平壤举行。此时辽已岌岌可危，行将灭亡。四月辛未高丽停用辽年号，次日（壬申）醮三界，当是为国祈福解厄。 |
| 25 | 十三年 | （二月）甲子，亲醮阙庭。 ^③ | 不详 | |
| 26 | 十四年 | 六月丙子朔，王如奉恩寺。甲申亲醮阙庭。 | 不详 | |
| 27 | 十五年 | （六月）丁亥，亲醮于福源宫。 | 祷雨 | 是年五至八月大旱，其间曾举行多次祈雨仪式，六月丁亥福源宫举行的斋醮也应是為了祷雨。 |
| 28 | 十五年 | （十二月）甲申，亲醮于福源宫，遂幸安和寺。 | 荐冥祐 | 此次斋醮在顺德王后丧毕后举行，斋醮结束后睿宗便往顺德王后真堂所在地安和寺。据此推测，这次斋醮应是为顺德王后荐冥祐。 |
| 29 | 十六年 | （闰五月）丙子，亲醮于纯福殿祷雨。 | 祷雨 | |
| 30 | 十七年 | （三月）乙卯，亲醮阙庭。 | 不详 | |

在三十次斋醮活动中，其目的大体可知的共计二十次，其中出于军事目的的共计六次。高丽王朝国小兵弱，来自外敌的压力是高丽政权始终面临的巨大威胁。睿宗二年十一月至四年七月，高丽与女真爆发战争。战争初期高丽大获全胜，但旋即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在此期间共举行禳兵醮三次。睿宗十年正月，阿骨打称帝，随即展开金灭辽的战争。作为辽的藩属国，高丽被辽国胁迫要求加入战争。如果对抗强大的金国，高丽将面临亡国的厄运。从睿宗十年到十一四月高丽弃用辽的年号为止，

① 本命日六十天一循环，故一年中有六个本命日，相应有六次本命醮。帝王的本命醮主要目的是为民祈福，属于有规律可循的常祀性质的宗教活动，史书中往往不会逐次记录，《高丽史》中对睿宗本命醮的记录仅此一次。关于本命信仰，请参阅刘长东《本命信仰考》，《宋代佛教政策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

② 此“三界”当指天地水三官，或上中下三元，而非欲界、色界、无色界。理由如下：1. 三官（三元）是道教信仰，三界观念来自佛教。2. 三界不是神灵，不可能成为醮祀对象；三官则是道教神灵，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是其核心信仰。3. 现存高丽时期的斋醮青词中有三元醮青词，却没有跟三界有关的醮文。高丽道教醮祀的“三界”应是三官（三元）之说，承蒙李丰楙教授提示，谨致谢忱。关于三元斋，请参阅张泽洪《道教斋醮符咒科仪》，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263-267页。

③ 《高丽史》诸本皆作“三月壬戌”（甲子是壬戌后第二日），后文又出现“三月丁酉”。自壬戌至丁酉共四十三天，三月并非闰月，而且此处没有二月的记事，可见“三月壬戌”应是“二月壬戌”之误。

出于为国解厄的目的共举行三次斋醮。由此可见,道教和佛教一样担负着护国的使命。^①高丽是个农业国家,气候的好坏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目的可知的斋醮中有六次是为了祷雨,说明道教还担负着护佑民生的任务。如果算上禳除雨雹之灾的斋醮,那么,出于祈祷风调雨顺目的进行的斋醮次数将达到七次之多。为生者祈福禳疾,对亡者表达终极关怀,是宗教的基本功能。为国王祈福的一次斋醮,为王室禳疾的两次斋醮,以及为亡故的王室成员“荐冥祐”的四次斋醮,反映了道教的这一功能。总体来看,睿宗举办的斋醮活动都有现实的考量,其目的都是为了护国佑民、祈福禳灾。

三、睿宗从宋朝引进道教的目的及其历史背景

睿宗的道教政策与高丽其他崇道君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大力主张从宋朝引进纯正的科仪道教,这也是他对高丽道教做出的最大贡献。诚如李能和所说,高丽早期的“种种醮祀,无非出于道教的意义,而但其行事,杂于佛教的思想,不可谓之纯全道教”。^②因此,睿宗派遣韩安仁向宋徽宗“进言”要求引进道教,并派李仲若赴宋学习道教,进而建立“斋醮科仪,一如宋朝”^③的中国式道观福源宫,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善高丽道教的科仪体系,提升高丽道教的水平。然而,这只是表层目的,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为了更全面地学习中国文化。高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慕华”的立国纲领,《太祖训要》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④在高丽人眼中,只有汉族政权才能代表华夏文化,在当时东亚诸国中也只有宋朝才是高丽学习的对象。睿宗堪称高丽王朝的一代贤君,被誉为“有中华之风”。^⑤其一生“崇尚儒术,乐慕华风”,有很深的“慕华”情结,“文轨同乎中夏”^⑥是其最高治国理想。当时宋朝的文化格局是“三教鼎立”,而高丽的情况却是儒释兴盛,道教不振。因此,向宋朝学习道教也是为实现其“文轨同乎中夏”的治国理想采取的必要举措。据《高丽图经》记载“或闻侯享国日,常有意授道家之策,期以易胡教。其志未遂,若有所待然。”^⑦考察高丽诸史,睿宗非但没有“易胡教”之举,相反,他对佛教的推崇要远远高于道教,他从未受过道策,却先后七次受菩萨戒就是最充分的证据。那么,徐兢之说是否是不实之词呢?通过《太祖训要》可以看出,高丽特别强调他们与契丹等蛮夷民族的区别,潜意识里是以华夏文化自居的。之所以“其志未遂”,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佛教传统在高丽已根深蒂固。其实,就是在极度推崇道教的道君皇帝宋徽宗统治下的宋朝,又何尝会以道教“易胡教”呢?但是,睿宗会产生以华夏本土宗教道教取代外来的佛教,以彰显本国作为华夏文化国家的特性的想法,并非没有可能。

其次,通过发展道教树立本国文化的主体地位。高丽虽然“乐慕华风”,但它毕竟是东夷民族国家,并非华夏正统。于是,传说中把华夏文化带入朝鲜半岛的华夏圣贤箕子就成为高丽“攀附”华夏的最好阶梯。^⑧因为本国文明是箕子开创的,所以高丽在文化上也便取得了华夏正统的地位;又因为箕子“不臣”于周,所以箕子开创的朝鲜国又具有强烈的本土特性。肃宗七年(1102)高丽官方

① 以佛护国是佛教传入韩国伊始的三国时代就已形成的传统,高丽立国后更加重视佛教的护国功能,《太祖训要》第一条就强调了诸佛对国家的“卫护之力”。在高丽历史上,每次遇到外敌入侵,以佛力禳敌护国都是高丽国采取的最重要的应对措施之一,比如著名的《高丽大藏经》的雕版,就出于禳敌护国的目的。参阅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十五《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第272-273页。

② 李能和《朝鲜道教史》,第389页。

③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笈散稿》卷三十九《道教仙书道经辩证说》,http://db.itkc.or.kr/itkcd/mainIndexIframe.jsp。

④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太祖世家二》太祖二十六年四月,第26页。

⑤ 李齐贤《栢翁稗说后集》,《益斋集》第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67年,第51页。

⑥ 金缘《清燕阁记》,《东文选》卷六十四,第420页。

⑦ 徐兢《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释氏》道教条,第93页。

⑧ 王明珂教授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一书中提出,文化与社会界限模糊的人群之间会相互攀附,在东亚历史上表现为“华夏边缘”人群攀附华夏,造成华夏认同在历史过程中的扩张。请参阅该书第241-244页,及第四至第八章,尤其是第六章《反思英雄徙边记:朝鲜与东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正式开始祭祀箕子^①，可以说就是借助箕子这一文化资源树立本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尝试，由此，箕子成为高丽文化的本土性与华夏性的连接点。据徐兢的记载，福源宫大门“前榜曰敷锡之门，次榜曰福源之观”。^②“敷锡”，语出《尚书·洪范》“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③可见福源宫的名称取自《洪范》。《洪范》传说为箕子所作，睿宗据《洪范》为福源宫取名，表现出强调本国文化特性的倾向，至此，作为本国文明开创者的箕子又和道教联系在一起。梁银容教授认为，睿宗的崇道行为反映了其“三教鼎立”的治世观。^④然而，睿宗眼中“三教鼎立”格局中的道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道教。1116年(即睿宗十一年)，睿宗进行了在位期间最重大的政治改革，在“颁新教以与物更始”的诏令中，睿宗强调要保护“三教”，但对保护道教的表述却是“四仙之迹，所宜加荣”。^⑤可见睿宗是把道教和新罗以来的本土“仙家”联系在一起的，道教从而获得了强烈的本土特征，成为高丽的主体文化而非单纯的外来信仰。

推崇道教的高丽国王不止睿宗一位，但为什么直到睿宗时才开始大力引进宋朝道教？这跟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学习中国文化是高丽的基本国策，宋朝一建国高丽便与宋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高丽、宋朝两国之间有强大的契丹，由于契丹的阻挠，两国外交关系时断时续。高丽文宗以后，随着契丹势力的衰落，两国外交关系才趋于正常。^⑥文宗朝以来，高丽国力逐渐开始恢复。到睿宗时，高丽国的文治武功达到鼎盛，与宋朝的外交往来也日益频繁。睿宗在位十七年，向宋遣使七次。除了朝廷间的正式遣使外，其他类型的外交活动也非常活跃。据中方文献记载，“政和(1111—1117)以来，(高丽)人使每岁一至”。^⑦频繁的外交往来，为从宋朝引进道教创造了有利条件。

睿宗在位期间正值北宋道君皇帝宋徽宗统治时期。宋徽宗是宋代最崇奉道教的帝王，睿宗崇道未免会受他的影响，比如郭輿得宠后被称作“金门羽客”，明显就是宋徽宗所创“金门羽客”制在高丽的翻版。睿宗三年遣使向宋徽宗表达学习道教的意愿，该使团回国次年(睿宗五年、大观四年)宋徽宗便派遣道士赴高丽传教，这表明宋徽宗对向高丽传播道教采取积极态度。此外，受宋徽宗宠遇的一些道教领袖也热衷于向高丽传教。据陆游记载“宣和和，林灵素得幸，乃白遣道士数人，随奉使往，谓之行教。”^⑧由此可见，睿宗在高丽大力推行道教也受到了宋朝道教界的鼓励。

Yejong of Goryeo and Taoism in Korea

Huang Yong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Yejong was the king who worshipped Taoism most during the Goryeo Dynasty in Korea. His Taoist belief and religious polici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 of Taoist faith in Goryeo Royal Family and the Taoist worshippers around him. The Taoist Rites he performed were practically to bless his subjects and country and to get rid of calamities. He strongly brought in the Taoist policies of Song Dynasty to promote Goryeo Taoism. Besides, the more important aspect is to learn Chinese culture thoroughly and set up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hrough Taoism.

Key words: Yejong of Goryeo, Taoism, Taoist rites, Taoist worshippers

(责任编辑: 李知恕)

① 郑麟趾《高丽史》卷六十三《礼志五·吉礼·小祀》杂祀条，第353页。

② 徐兢《高丽图经》卷十七《祠宇》福源观条，第84页。

③ 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9页。

④ 梁银容《福源宫建立の歴史の意義》，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と韓國文化》，第496页。

⑤ 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四《睿宗世家三》睿宗十一年四月庚辰，第205页。

⑥ 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7页。

⑦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六钦宗靖康元年十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92页。

⑧ 陆游《家世旧闻》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2页。